

李伯宁 著

我的水利梦



中国三峡出版社

我的水利梦

李伯宁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水利梦/李伯宁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5. 11

ISBN 7-80099-123-7

I. 我… II. 李… III. 水利建设-中国-史料 IV. F426.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1202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53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8.00 元



作者像

前 言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各种不同的机遇或遭遇，每个人的一生也有不同的梦想和追求。有的人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有的人则由于幻想破灭而失望沮丧，悔恨终生。但也有的人，在执著地追求和梦想中，虽经百般挫折、坎坷，而无悔无恨，痴心不改，自得其乐。我基本上属于这第三种人。

一个梦想不到的机会，在 1949 年底，我随同李葆华同志参加了与傅作义先生组建共和国水利部的工作。从此，一个猛子扎在水里，一晃就是 45 年。在这由中年到老年的多半生中，我饱尝了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之相联的人际关系间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这大多反映在我几十年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不同时期写的文章、小说、电影、电视、诗歌等文艺作品中。再过几个月，我就年满 77 岁了。出版社和一些知心朋友们，大概考虑到岁月不饶人，在我这有生之年，不知哪会儿有个好歹，热情地建议我把几十年来有关水利的讲话、文章整理出版一本书。一作纪念，二为对研究新中国水利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点参考资料，以便在我经历过的成功的或失败的，正确的或失误的经验教训中，拾取出一些有利于今后水利事业发展的铺路石来。鉴于此，为尽到作为一个新中国水利史的见证人的一点义务和责任，我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编成本书，并取名为《我的水利梦》。

世间事物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

水是生命之源，水也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因而也就没有农业和工业。我国的水利事业，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比上天（卫星）还难”的伟大事业，它是改天换地向大自然宣战的斗争。这个艰难复杂的斗争，涉及到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涉及到地区与地区间的，部门与部门间的，局部与全局的，国家、集体与个人间的，领导与领导间的，领导与被领导间的，领导与群众间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利益、权力和责任；涉及每个人的不同实践和经历，不同的思想认识，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这种种差异所形成的矛盾和斗争，编织成一个矛盾重重、风云难测的复杂社会，编织着每个人的五彩缤纷、瞬息万变的奇幻的梦。我也在其中，因而产生了这本《我的水利梦》。

我自1949年底参加组建水利部起，就和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生死恋。于是无穷无尽地做起水利梦来。这里有美梦，有恶梦；有快乐的梦，有痛苦的梦；有天真的梦，有困惑的梦；有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纵情高歌的梦，也有转而风云突变，乌云滚滚，泰山压顶，喘不过气来的梦；有昂首阔步，风流倜傥，驰骋疆场的梦，也有转而艰难险阻，紧裹着玻璃小鞋，寸步难行的梦。我常是圆了旧梦，又做起新梦；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莫名其妙的梦……

我走进水利部的大门，首先做起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洪水猛兽”梦。把我引入这个梦乡的，是历史上触目惊心的水旱灾害资料和传说。而且这个恶梦说不定在哪天哪个地方又会成为现实，我也有可能在恶梦未醒时，就被恶浪卷走，成为鱼鳖的美味佳肴。我怕圆这个年年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恶梦，于是又梦想起大禹，梦想起李冰父子和历代治水名家、功臣来。梦想我这个“水兵”，也应该像前人那样，追求和实现驯服洪水，让人民过着旱涝无忧，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

从1954年江淮大水，我被中央防总派往武汉市参加防汛时

起，就又做起三峡梦来。那时被长江洪水包围的武汉市，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亏了老天没有再大兴风浪，侥幸没遭灭顶之灾；在此后几十年，无数专家权威们研究来研究去：只有三峡工程能保它的驾。我这个三峡梦也就一直像了38年，直到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梦幻成真。但接着我又做起100多万人的三峡移民梦来，这一伟大事业，前途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按照开发性移民方针和8年移民试点经验，不失时机地坚决贯彻下去，是能够移得出，安得稳，富得起来。二是如果重走老路，浪费了时间，丧失了时机，就可能后患无穷。其结果如何，大概我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今后能圆个美梦，千万不要圆个恶梦。

对黄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我也都有多少年的恶梦和多少年的美梦。在我有生之年，希望恶梦很快成为历史，美梦很快能成为现实。我想这也是12亿人的共同愿望。

水利一直是个贫困行业，从50年代末起，几十年来，我曾梦想通过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发展水利经济，来改善职工生活和跨入先富行业。在水利建设和管理上，改变单纯依靠国家，走自力更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新路，并把它作为水利改革的主攻方向，各流域、各地区水利系统通过壮大水利经济，逐步成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雄厚的、举足轻重的实力和先富行业，尽早摆脱兴修水利单纯依靠国家的局面。从目前的势头和前景看来，这是大有希望的，但关键还要继续破除曾长期束缚着一些领导干部的陈旧观念，打碎习惯势力的枷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和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的新路来，这才有可能早日圆了我这个多年的美梦。

另外，我还有些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梦。如由于我不会随风倒，要两面派，不会弄虚作假只唱赞歌，而直言贾祸。如为说几句1980年我国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而被某些领导批判一通。为给一个县水利员平反冤狱，反被诬为干涉司法，包庇坏人，

而被审查。为宣传水利，反驳以林业代替水利的错误观点，而引起个别权威人士的反感和批评。这种种恶梦都已成为历史，并愿永远永远地成为过去。但在我的生活中，却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这就是说真话、讲实话不易，这需要勇气，还要敢冒风险，有时甚至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说假话就容易得多。我就看到过这样的人，他对领导说瞎话，张口就来，瞪着眼地谎报军情，甚至把黑的说成白的，却毫不脸红。编瞎话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讨人一时的喜欢。因此社会上一些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报喜不报忧的人，有时反倒容易得到某些人的赏识。我希望改革的春风，反腐败的春风，党的四中全会的春风，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的春风，能彻底扫荡这臭不可闻的腐败风气，能彻底清洗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环境，这是12亿人共同追求的理想梦。能圆了每个人这心头甜美的梦，那么圆我水利梦的步伐，也就加快了。

最后有两点我要特别说明：一是书中所有文章是几十年的历史资料。在资料中每个时期有当时的统计数字、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观点，由于时间的变迁，因此，按时间排列起来，数字和观点有些前后不尽一致。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我没有改动。我也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历史，篡改历史。二是本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我的秘书冯仲凯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还要感谢长期对我工作进行无私帮助的周振先、乔玉成、赵书鹏、冯仲凯同志热情地为本书写了序。他们的序，既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又充实和补充了很多历史资料，这对增进读者对水利历史和我本人的了解是有意义的。

李伯宁

1995年3月12日

序

伯宁同志是我国水利界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尊敬的老领导，他自从1949年新中国组建水利部起，一直在水利战线工作。历任水电部和水利部副司长、司长、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1984年，中央决定成立三峡行政区（后改为三峡省），伯宁同志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1986年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伯宁同志任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以后，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伯宁同志任副主任。40多年来，伯宁同志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我国的水利事业。《我的水利梦》一书，生动地再现了伯宁同志的奋斗历程，反映了几十年来他对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三峡工程和开发性移民，以及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发展水利经济和水利改革的执着追求和远见卓识。历史的发展和实践，也证明了伯宁同志的许多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由于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四人曾先后荣幸地担任伯宁同志的秘书工作。这些年来，他那严谨求实、诚挚谦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正直无私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受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更让我们由衷地感到振奋。

对于认准了的事情，伯宁同志从不优柔寡断，半途而废。过去，在水利建设上，由于受“左”的影响，长期以来，只是热衷于修建工程，大办水利，而对已经建成的大批水利工程，如何管好、用好，使它充分发挥效益，则不被重视，形成了一种“重建

轻管”的思想。不像其它工厂，建成后，就有一套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有必要的人员、编制，有必要的财源和物资渠道。这就势必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许多工程，由于管理不善或遭到破坏，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或效益逐渐降低，严重的甚至造成事故，酿成水害。针对这种情况，伯宁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积极倡导在水利系统大力发展综合经营和推进水利改革，即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利用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和现有工程设施，积极开展农、林、牧、副、渔各业以及加工、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经营。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有一番曲折和坎坷的历程。水利综合经营的发展也不例外。正当这一新生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立即遭到了旧的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许多同志认为，搞综合经营是和工程安全与发挥效益相对立的，是在水利管理上的不务正业。在这种情况下，伯宁同志仍满怀信心，坚信发展综合经营是我国水利改革的一条重要出路。他五下湖南省桃源县，对这个新发现的典型进行调查研究。1978年，在伯宁同志的提议下，水电部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了全国水利管理会议，学习推广桃源县水利管理和开展综合经营的先进经验。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所有水利工程要在保证工程安全和充分发挥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并根据不同情况，限期达到管理经费自给的要求。这就为水利综合经营，正式在水利管理单位上了“户口”，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我国水利综合经营发展的里程碑。从此，水利综合经营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发展。桃源会议以后，紧接着在1979年和1982年，在伯宁同志的主持下，水利部分别在广东东莞、江苏镇江召开了两次综合经营会议，使我国水利综合经营又连续迈上了两个新台阶。1984年，在欢庆建国35周年前夕，水电部在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全国水利系统综合经营产品展销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各部门对这次展销会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对我国水利综合经营给予了

充分肯定。随着水利综合经营这一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大大调动了广大水利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全国水利综合经营产值已由1978年的3亿多元，达到1994年的600亿元，16年增加了200倍。人们都称伯宁同志是我国水利综合经营的创始人，这是有道理的。

伯宁同志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和高级职称，但他却通过刻苦自学和不断实践，知识深厚、经验丰富，并对党和人民的水利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常在一些危急关头，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担风险，敢于果断决策，从而避免了多次重大灾害的发生。我们记得，在1981年，黄河上游发生大洪水，正在施工中的龙羊峡水电站，围堰面临被漫坝冲毁的危险，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有人认为洪水超过了围堰防洪的设计标准，抢护有困难，应保刘家峡大坝，主张对围堰不需积极抢护，并提前加大刘家峡泄洪流量。而伯宁同志立即组织专家，密切注视上游水情变化，并查询围堰设计标准和工程质量。经过认真分析，全局运筹，既要考虑工程安全，又要确保下游群众安危，果断地提出了在龙羊峡围堰上抢筑3米高子堤，并严格控制刘家峡泄洪流量的主张。当时，中央主管防汛的余秋里副总理，果断地采纳了伯宁同志的意见，这样既保证了龙羊峡水电站工地的安全渡汛，又确保了下游兰州市、京兰铁路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得了那一年黄河防汛斗争的胜利。1984年，汉江发大水，安康城被淹。伯宁同志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亲赴安康指挥抗洪。当时，有人见安康城既已被淹，主张放弃安康，另迁新址。而伯宁同志积几十年防汛之经验，深知汉江后期来水较多的规律，提出了迅速堵复城墙破口的建议，以免安康再次被淹。万里同志当即采纳了伯宁同志的意见，很快组织力量，堵复了城墙缺口。果然，当年汉江又来了两次洪水，而安康城却安然无恙，免遭再次被淹。1985年，伯宁同志刚刚到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不久，就遇上了秭

归新滩镇发生山体大滑坡的严峻险情。6月1日湖北省政府发出命令，要求新滩镇1300多名群众全部撤离，但迟至6月9日，仍有300多名群众坚持夜间在家看守财物，不肯撤离。伯宁同志9日刚刚回到宜昌，听到了这一汇报，他联系历史上新滩曾多次发生大滑坡的史实，立即意识到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于10日上午召集紧急会议，下死命令限10日晚10时前，将滞留在新滩镇的300多名群众强行撤出，否则严肃追究地、县领导责任。在伯宁同志的果断指挥下，各级干部和公安警察、人民解放军一齐出动，挨户清查，使新滩镇所有群众于当晚8时全部撤离。伯宁同志听到报告后，又命令再次复查，夜10时才全部撤退完毕。到6月12日凌晨3时，轰隆一声巨响，果然发生山体大滑坡，整个新滩镇瞬间被推入长江80米。事后，伯宁同志去慰问灾民时，群众呼拉一下向他围过去，拉着他的手，含着泪连连高呼：“共产党万岁！”因为历史上新滩多次滑坡，均死伤惨重，此次滑坡，整个新滩镇全部被毁，却无一人伤亡，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群众无不感激。当时的国务院李鹏副总理打电话对伯宁同志进行了表扬。

伯宁同志秉性耿直，敢于直言，实事求是，对于个人的毁誉，伯宁同志从来不计较。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敢于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从不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伯宁同志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如关于1980年在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伯宁同志在1978年由萧华同志主持召开的西北各省第一书记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西北问题座谈会上，毫不保留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成。但伯宁同志回到北京后，却由于这一发言，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些人说他的讲话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说他武断、片面、狂妄，说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积极的，尽是吹冷风；说他违背党章，违反民主集中制，把大家的思想都搞乱了；说他是反对中央的十

一大路线，反对华主席召开的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反对毛主席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示等等。帽子扣了十几顶，可以想象在当时“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政治气候下，压力是很大的，但伯宁同志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没有屈服。历史已对此作了结论。值得人们回味的是，讲真话，坚持一个真理，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

1985年，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伯宁同志作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小组的讨论。当时，很多人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突飞猛进所鼓舞，对农业和人民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则很少提及。而伯宁同志毅然直言，如实地反映了三峡地区的贫困情况。并建议国家把解决上亿人的贫困和温饱问题，提到战略地位，摆到领导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之前，伯宁同志亲自组织拍摄了一部《穷山在呼吁》的录像片，反映三峡地区贫病交加的情况。这部录像片在内部试映时就遭到了当时某些负责同志的非议，指责这是与宣传当前农村大好形势唱反调，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而伯宁同志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于是把这部录像片复制几十部，分送给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并亲自到民政部、水电部、卫生部、农业部、林业部等有关部门放映。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经请示同意，也获得了放映，让大家了解到在这美丽的三峡两岸，还有触目惊心的贫穷。伯宁同志的发言和《穷山在呼吁》这部录像片的放映，虽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但终于赢得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极大重视。会后，在俊生同志主持下，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三峡扶贫问题。新华社《内部参考》也刊载了伯宁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给他来信，要求捐钱、捐物。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是在这次会议以后成立起来的。从此，全国的扶贫工作，作为战略大事，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并蓬勃展开，取

得重大进展。这圆了伯宁同志的一个梦。

伯宁同志那种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常常对我们说，人生在世，要淡泊名利、级别和地位。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85年，中央决定按150米方案兴建三峡工程，为妥善安置库区几十万移民问题，同时决定成立三峡省筹备组，任命伯宁同志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这时，伯宁同志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按道理，他完全可以退下来休息，而伯宁同志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担当起了这个历史重任。由于在这期间中外有些人强烈反对兴建三峡工程，中央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并把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三峡地区的移民试点和扶贫工作。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期间，伯宁同志作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旗帜鲜明地坚决主张三峡工程早上，快上。不论在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会议上，还是在论证小组和全国政协召开的会议上，伯宁同志总是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强调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伯宁同志总是耐心地积极地做工作。对于个别别有用心，企图通过反对三峡工程而反对共产党，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人，伯宁同志则坚决地进行说理斗争。特别是在三峡移民问题上，伯宁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所制定的改革一次性赔偿为开发性移民方针，领导库区进行了8年移民试点，取得了开发性移民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承认和库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人们都说，伯宁同志为三峡工程的兴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有的把三峡开发性移民称之为“李伯宁工程”。这实际上是对伯宁同志的高度赞扬和评价。伯宁同志在三峡工程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据我们统计，为促进三

峡工程早日上马，1990年伯宁同志给中央领导和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信件和建议达400多封，1991年达700多封。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已成为中央重大决策的依据。如在1990年，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伯宁同志联名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日常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收到这一提案后立即批示，并转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李鹏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很快听取了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情况的汇报。1991年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伯宁同志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向王任重副主席建议，希望加强对三峡工程的宣传，并盼中央果断决策，尽快开工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王任重副主席接到这封建议信以后，又立即转给了中央各常委和邹家华副总理。江泽民总书记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从此，各新闻媒介逐步展开了对三峡工程的宣传工作，使人们都来认识三峡，都来了解三峡，解除了社会上一些对三峡工程不甚了解的人的种种疑虑。伯宁同志为了进一步促进三峡工程上马，还组织编辑了《三峡在呼唤》的录像片，分送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长江沿岸各省领导80多人，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王震副主席看后表示“心情极不平静”，并写信告诉伯宁同志，说他自己“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同时，还和王任重副主席共同组织了专家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上书中央发出强烈呼吁。不可否认，伯宁同志所做的这些工作，对1992年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顺利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是做了最大努力和尽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的。

伯宁同志对待工作认真调查研究，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三峡工程百多万大移民，这在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中央提出开发性移民新方针，但究竟什么是开发性移民？在三峡库

区如何具体组织实施？这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尤其是对于库区几十万农村移民，开始有些人认为，三峡库区人多地少，淹没了30多万亩耕地，大部分农民需要“农转非”，通过兴办工业来进行安置。伯宁同志开始也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于是在移民试点中，先办起了28个工厂，安置了2000多人。但伯宁同志很快发现，能进工厂的，只是一些知识青年，对于一些老弱病残者，还是无法安置。这样，不但不能达到以户销号的目的，而且即使进厂的移民，如果本人素质差，不能被企业优化组合，或工厂经营不善发生亏损，发不出工资，甚至倒闭等等，移民又得返回来要求政府重新安置，这将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带着这个问题，伯宁同志不顾年迈体弱，不只一次地走遍了库区所有涉及淹没的县、市，广泛地接触库区干部群众，从调查研究中寻找安置移民的出路。他逐渐发现，三峡库区虽然淹没30多万亩耕地，但好地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坡地、低产田，可以通过改造，把未淹土地变成高产稳产田。而且库区有大量荒坡地、草地可以开发利用，不但有条件弥补因淹没土地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通过大农业开发，发展各种种植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养殖业、农牧加工业等，有足够的容量，绝大部分移民可以实现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并为库区移民走向小康和发家致富创造条件。伯宁同志的这一思路，很快得到了库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从而使库区农村移民，找到了一条搬得出、安得稳、富得起来的有效途径。经过8年移民试点的实践，伯宁同志对开发性移民方针，总结出了7条经验，这概括了开发性移民的内涵，实践证明这7条经验，不只对三峡库区进行开发性移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今后其它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也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伯宁同志出生于农村，他在水利工作中，也一直关心着农村情况，关注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在70年代，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在歧路彷徨，也深深触动了伯宁同志。他忧虑，他思考，也在

探索如何摆脱农村困窘之路。

1978年，伯宁同志作为水电部的代表，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20年庆典的中央代表团。他就此之便，深入宁夏有名的西海固贫困地区，进行农村和水利调查，亲眼目睹的西海固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深深打动了。他先后在海原、固原和西吉等县农村调查中发现，在这些贫困县农村中，有的户和有的村组，生产、生活搞得很好，院里院外，树木葱葱，一派生机勃勃。同是贫困区，条件也相同，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伯宁同志仔细问个究竟，开始干部群众都笑而不答。后来才告诉他，这些户都是偷偷搞承包到户的结果。他于是向县村干部宣传推广他们的经验。在中央代表团结束考察向区党委汇报工作时，伯宁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向自治区领导也介绍了海原、西吉包产到户实现脱贫的经验，并建议在全区进行推广。后来长期在宁夏工作的一个老战友告诉伯宁同志，说他在宁夏进行包产到户的宣传，引起了一场风波。当时的一位县委书记，由于接受了伯宁同志的建议，推广包产到户的经验，而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说“不要相信李伯宁那一套”。随后，即被免职。直到承包到户取得合法地位时，该县委书记才被安排在地委重被启用。像宁夏这样的“漏子”，伯宁同志在197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还捅过一次。当会议讨论农业和农村工作时，伯宁同志曾举了宁夏西海固包产到户的例子，并认为昔阳大寨的分配是“大锅饭”的办法，没有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在那个对大寨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任何缺点的年代，伯宁同志的发言，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非议，并把伯宁同志的发言，反映到水电部党组，认为这个发言是不妥当的，错误的。党组负责同志问伯宁同志：“你在计划会议上又捅了什么漏子？”伯宁同志讲了发言情况，并坚持认为他的观点没有错误，党组没有深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1982年春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有很大争论，伯宁同志回到老家沧州地区，借检查水利